



中国共产党 指导思想命名的多维视角研究

张兴亮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指导思想命名的多维视角研究

张兴亮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圣涛

封面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命名的多维视角研究/张兴亮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01-015639-2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指导思想—研究 IV. ①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8829 号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命名的多维视角研究

ZHONGGUOGONGCHANDANG ZHIDAO SIXIANG MINGMING DE DUOWEI SHIJIAO YANJIU

张兴亮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978-7-01-015639-2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江西省“十二五”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版经费资助

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表述科学化研究”
(14DJ02)研究成果。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命名： 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自序)

——

指导思想的命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意识形态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党的理论建设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正所谓“名正才能言顺”。对拥有 8700 多万党员且在发展中大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到“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命名建设取得了来之不易的硕果,同时在新形势下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重申毛泽东提出的“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强调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梦”、“四个全面”等新表述为标志的理论创新,为本书的写作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视角。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是笔者学术生命中的重要结晶,笔者一直期望以最好最新的营养来滋养它。博士毕业三年多,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命名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也写了若干论文。这些最新内容,有的融入了本书的写作中;有的由于全书框架的原因,还难以融入。在修改过程中,继续加强全书整体结构的逻辑性和均衡性。这样可以避免各部分内容的冲突和重叠。把叙述不充分的部分再加以补充,尽量使分析更本质、更全面。每章每节之间加入铺垫性陈述,使之更连贯。总之,使全书内容更加集中,达

到系统化、聚焦化,充分突出主题。至于不太相关的内容,能删则删,或者使之深化与全书主题的相关性。

本书在写作时曾在大标题和小标题中多处使用了“维度”一词,主要是为了使表述更学术化。鉴于全书的写作过程经历了多种视角的转换,为了整合这些研究成果,因而书名中使用“多维视角”一词。就各个章节的关系,笔者归纳为:“围绕指导思想的命名,各个章节之间形成思维链条,环环相扣,自然延伸。”由于本书的立足点是理论创新,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把每个对应的维度都加以研究。虽然从标题上看,与“因素”相关的是第三章和第五章,分别涉及时间因素和主体因素。实际上,全书涉及指导思想命名的方方面面,但因为这两个因素比较突出,所以笔者作为重点加以研究。至于其他因素(如大众的认识因素;国家的文化传统;等等),则融合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

记得当初吴声功老师告诫笔者,选择这个题目是需要勇气的。当时没有觉得什么,但现在想来,本书创作的难度超出了笔者的想象,吴老师的预见是十分准确的。好在困难可以一点点克服,可以咬住青山不放松。经过自己的不断反思、构想、探索,时而会发现新的理论生长点。笔者的创作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长大”。“理论之树”终于慢慢地长成,虽算不上参天大树,但发育得基本完整。

本书的写作难度超出了当初的想象,重点和难点在写作过程中也不断凸显出来。本书需要不断重构常识性知识,打通阻碍知识和常识互通的瓶颈,梳理出重点和难点。这些重点和难点,首先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命名的理论基础。以往学界在这方面极少涉及,构建系统性、规范性的理论依据成为当务之急,不仅对古今中外思想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命名思想和意识形态理论需要进行系统深入挖掘,而且需要把命名学、分析哲学、解释学、符号学、语言学、文本学、逻辑学等中外学界的理论成果吸纳为本课题的理论基础。

二是指导思想命名的方法论。本书的落脚点是“怎么办”,比如,怎么避免指导思想命名的冗长表述?指导思想怎样命名才更具权威性、稳定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部命名如何兼容?这既要增强方法的实效

性，又要有顶层设计的视野，需要处理好指导思想命名中“名”与“实”、“一”与“多”、“常”与“变”、“源”与“流”、“内”与“外”、“显”与“隐”等辩证关系。如何把指导思想命名的规律和原则表达得更加明确，甚至加以细化，从而进行适当的前瞻性预测，这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正如方世南教授所指出的，执政党指导思想命名的方法论应该做到十四个“性”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现实性与未来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领袖性与群众性的统一。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既是同为一体的，又是交替进行的，不断推动理性认识的深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所说的：“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本书的修改既是研究方法的深化，也是叙述方法的锤炼。

— —

虽然在绪论中，笔者对选题价值和研究状况有专门论述，但限于笔者的认识能力和学术水平，这些内容显得非常之薄弱。现根据笔者的新认识，补充一些内容。

（一）本选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1. 学术价值：本课题有利当前研究由零散走向系统，开拓指导思想研究的新视野；本课题努力从理论上揭示指导思想命名规律，可为顶层构建融通中外的指导思想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指导思想命名问题事关党的理论基础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科学性,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构建指导思想命名的学术话语体系,有助于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丰富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2. 应用价值:专题探究指导思想命名,可为推动指导思想命名体系的科学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本课题有利于推动指导思想命名的全球传播,可优化执政党的形象设计、执政合法性、党际交流以及国际话语权等重要方面;本课题积极回应关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命名的思潮,探究应对机制,可开拓引领思潮、凝聚共识的新路;本课题以指导思想命名体系的科学化统观,可为思政课整体性改革等方面提供新视角。

关于本书的研究,笔者曾致函请教命名学科的开拓者、国际命名学会会长马鸣春教授。他不仅把本书列为国际命名学会应用研究系列丛书之一,而且非常细致地答复,特摘录如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命名问题研究”这一课题,极有意义。一是它属于“术语学”研究,反过来,可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体系(学派)作出贡献。二是它属于“政治管理术语学”范畴,较之“经济管理术语学”,其研究相对薄弱,大有用武之地。三是它属于“马列主义理论术语学”,其研究具有广阔前景,在当今世界思潮氛围下,具有特殊意义。四是它属于“政党指导思想术语学”,这一研究,在世界范围,尤显薄弱。五是它属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术语体系”,建党近百年,经历三个阶段,内容丰富,举世瞩目,研究它,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简要评述

国外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命名的研究主要蕴含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研究中,代表作如美国历史学家F.舒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F.舒曼(1966)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结构分为纯理论和由实践产生的理论,两部分有机组合在一起。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现状作出详尽分析的,如德国汉学家F.哈尔迪希的《今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改革党》。F.哈尔迪希(2008)指出,中共领导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奉行了一条去意识形态化的原则,推崇实用主义。另外,S.R.施拉姆、B.史华慈、M.迈克斯、保罗·哈里、雅克·比岱、郑永年、凯瑞·布朗、胡利奥·里奥斯等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进行了研究。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2012）认为，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理论”到“科学发展观”，都是执政党重建意识形态的努力。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研究员凯瑞·布朗（2012）认为，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既为追求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合理性证明，又充当中国日益分化和冲突的社会的共识基础。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2014）指出，传统思想的兼容并蓄、共产主义观念和对西方思想新的贡献构成了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思想基础。

总体上说，国外学者一方面看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继承性，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总体上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有根本差异；另一方面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其在命名等方面的细微变化。国外学者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但由于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我们不一致，因此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命名的理解有原则的区别。

相比国外学者对指导思想命名问题较少直接涉及，国内学界在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我们通过中国知网（CNKI）进行高级检索，检索项为“主题”，检索词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表时间为1979年到2014年，共检索到相关记录284条。其中，1979—1988年0篇，1989—1997年29篇，1998—2003年37篇，2004—2014年173篇。总体看来，成果发表呈波动状，1997、2003、2013这三个年份位于波峰，正好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正式命名时间相一致。可见，全国党代会召开前后，人们对指导思想命名问题的探讨呈显性状态；而其他时段，多处隐性状态。以“指导思想命名”为篇名进一步检索，发现整体性专题研究指导思想命名问题的论文不足10篇，相关观点散见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研究中。

经过认真研读、梳理和分析相关文献，可把国内研究成果大致分为如下情况。一是较为鲜明地指出了指导思想命名的意义。如商志晓（1996）指出，指导思想命名问题看起来似乎比较简单，实际上却非常严肃、关系极大；孙显元（2011）强调，对理论成果的命名，不只是名称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对理论成果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二是较多地探究指导思想命名对策。如董德刚（2007）提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只需列出基本原则就可以，不要那么多理论

名称;李忠杰(2009)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的丰富成果可按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内容体系分别冠名,同时应在总体上有个大名称将它们整合起来;程恩富等人(2012)指出指导思想现在多种提法并用,建议今后统一使用更简洁的提法,以加强提法的规范化和对称性;王怀超(2014)建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三是对指导思想命名进行了初步的分类研究。如周金龙(2010)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有三种命名方式,同一理论成果可以有不同的命名。四是对指导思想命名效应进行了初步的辩证分析。如赵明义(2004)认为,以主要创立者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存在正负双重效应,应注意将负效应降到最低点。五是对指导思想命名的由来进行了初步研究。如赵连文(2004)、肖思科(2001)、江波(2004)分别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命名始末;高放(2013)以国际共运的视角阐明了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来龙去脉。六是从内在结构的角度初步考察了指导思想的命名系统。如吉彦波(2003)认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在具体内容、指导作用和内涵发展方面具有层次性;姚选民(2014)认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之间呈现理论层级性和效力层级性。

总体来看,国内外成果为本课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留下了相当大的研究空间。一是现有成果多为几句话或一段话,专题论文不多,专著几乎没有;二是平面直线式研究的多,以命名学等角度来立体研究的少;三是直觉式研究指导思想命名由来、命名对策的多,进行深度理论分析的少;四是正面宣传论断的多,回应指导思想命名思潮的少;五是从党的指导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较多,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较少;六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等单个命名的多,总体联系起来研究指导思想命名体系的少。显然,围绕本课题的基础理论研究亟待拓展和深化。

三

政党指导思想命名问题涉及对政党领袖的作用及其思想的评价。这是唯

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本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本书对此作了艰难的尝试，但研究还是非常粗浅的。在此，就本书对领袖姓名命名指导思想的研究，作一个简要回顾，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指点。

（一）关于领袖姓名命名指导思想的总体说明

1. 从命名意义看，以领袖姓名命名是指导思想极其重要的命名方式。在国际共运处于低潮，或国内外形势处于关键时期，一个重大战略是用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的姓名命名指导思想。把这样的指导思想作为高举的旗帜，成为凝聚人心的象征，成为回击敌对势力和怀疑力量的有力武器。

2. 从命名原因看，以领袖姓名命名指导思想，主要基于领袖的独特作用。一是领袖的理论独创性；二是领袖的独特引领性；三是领袖的任职期限性；四是领袖的命名权威性。领袖和党具有同一性，领袖思想与党的指导思想具有同一性，由此，领袖核心作用的独特性与指导思想名称的专指性直接对应。

3. 从命名效应看，以领袖姓名命名指导思想，可能产生的效应或正或负。既可能产生推动发展的指导作用等正效应，也可能导致阻碍发展的教条主义等负效应。纵览指导思想命名史，其正效应是主导性的。不能因为出现过负效应，就把这种命名方式等同于负效应。负效应的产生不是必然的，只有具备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才有可能。

4. 从命名走向看，能否以领袖姓名命名指导思想，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种政治力量、智慧资源、国内外环境、党内外民意等因素形成的合力，决定了指导思想最终使用什么名称。指导思想命名及其命名方式，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若条件适宜，同样还可能出现以领袖姓名命名指导思想的情形。

（二）研究创新之处

1. 两类命名的辩证审视。本书首先把“领袖思想”同“指导思想”区分开来，然后从命名学的角度分析“指导思想命名”与“领袖思想命名”的关系，厘清两者各自的整体性命名与局部性命名。把“指导思想命名”与“领袖思想命名”看成各种智慧生成与互动的过程，进一步分析两者实现统一的社会化过程。

2. 两种效应的权衡比较。从命名方法的角度看，用领袖姓名命名指导思

想,作为一种特别具有概括性的方式,有可能产生正负两种效应。即既为理论研究留下了弹性空间,具有纪念、评价、凝聚共识等功能优势,但也容易形成话语依赖和思维固化,为日后的质疑和争议预备了可能性。本书厘清负效应的产生根源和发生机制,同时针对与负效应相伴的社会思潮,指出其要害,提出应对之策。

3. 命名过程的系统分析。为了深入分析指导思想命名中的领袖因素,本书初步考察了思想与生命、个人与集体、个人智慧与集体智慧、领袖与领导集体、命名习惯与命名创新、命名形式与命名内容、正式命名与过渡命名、命名空间与命名时机、整体命名与局部命名、指导思想的非权力性影响与领袖职务的权力性影响等辩证关系。

4. 领袖人物的多元认识。领袖,可以是精神领袖(总设计师),也可以是政治领袖(领导核心)。领袖不仅是指导思想的命名主体,也是命名客体。本书选择国际共运史上四位代表性领袖人物(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指导思想命名中的正反诸因素进行总体性考察和比较,初步挖掘了个体身份与领袖身份、政治生命与生理生命、思想存在与人身存在、政治影响力与思想影响力等深层次关系。

(三)研究的理论价值

1. 有利于开拓指导思想命名研究的新视野。本书从命名学的角度,探寻指导思想研究和领袖研究的汇合点,吸纳命名学、领袖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系统挖掘指导思想命名体系中的领袖因素,层层递进,逼近深层次理论问题,开拓指导思想命名研究的新途径。

2. 有利于深化唯物史观中关于领袖评价的研究。本书从指导思想命名这样一个看似很小的角度,切入国际共运史上关于领袖定位的重大问题,深入到领袖角色、领袖思想、领袖智慧、领袖权力、领袖生命、领袖作用等方面,从而构建科学的领袖观。

3. 有利于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的认识。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最重要的主体。领袖的理论创新成果,既会上升为政党的指导思想,也会凝练为政党的理论基础。要创新指导思想和夯实理论基础,必须正本

清源，反思领袖作为生命个体、思想个体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由此可以发现领袖的理论创造活动受制于领袖的任职期限、生命长度、知识结构、精力状况、团队分工等诸多因素。

（四）研究的社会价值

1. 有助于引领大众舆论，辩证把握指导思想命名趋向中的领袖因素。大众舆论十分关注指导思想命名的当下走向，关心领袖因素在指导思想命名中处于什么位置。专题探究指导思想命名的领袖因素，既是及时、主动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也为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创造条件。

2. 有助于加强政治命名的顶层设计，推动指导思想命名体系的科学发展。综合考察指导思想命名的领袖因素，可为指导思想命名体系的顶层设计提供决策参考，为构建融通中外的指导思想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3. 有助于正确对待领袖思想与指导思想的关系，增强指导思想阐释的科学性。领袖姓名命名的指导思想，人们耳熟能详，然而对其确切含义却时有纷争。深入阐述指导思想与领袖思想的内在关系，消除指导思想表述中可能存在的负效应，可以开拓指导思想的表述空间，增添指导思想创新活力，推进指导思想的大众化宣传。

四

命名问题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笔者把命名问题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一块敲门砖、一把尺子，希望借此客观深入地沟通和衡量古今中外对指导思想问题的认识，乃至探寻学术共同体的共通话语。要实现这个理论设想，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恐怕需要一辈子的心血。首先，笔者将长期研究政党指导思想命名问题，大致沿着这样一条路线：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命名——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指导思想命名——世界主要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命名——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指导思想命名——全球各政党的指导思想命名。本书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主要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命名建

设问题。

为此,本书把“指导思想”作为总体性概念,以“指导思想的命名”为切入点,然后把指导思想命名的理论在各个方面加以细化,逐步达到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书定位于基础理论研究,着重常识的重新揭示,既包括基本概念体系的澄清,也包括基本理论框架的梳理。本书围绕命名问题层层递进,竭尽全力予以解答,即便一时难以解答,也一如既往地作为学术目标。

“文化是国家的灯塔,如今的中国正在全速夜航,我们需要一个指引,一个方向,一个给予信心的力量。”^①这句话对于说明指导思想之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性,或许是适当的。本书主旨不在于简单地寻求问题的答案,也不认为有固定不变的答案,而在于为指导思想命名问题的探究贡献绵薄之力。

本书的写作正是有感于现实问题,但肯定挖掘得还不够。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围绕是否把科学发展观直接列入指导思想,思想界颇多争议。有人认为可直接列入,也有人认为不必如此,只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可。本书有两节是论述上述问题的,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定位”和“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定位”。在指导思想命名问题上认真研究中共中央文献的论述是十分必要的,但仅满足于此是不够的。站在指导思想命名建设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等作为指导思想名称所具有的特殊蕴含,将获得许多有益启示。

有学者向笔者提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目前的命名是否规范?若规范,原因何在?若不规范,原因又何在?笔者认为,很难笼统地说指导思想命名都是规范的,或都是不规范的。因为指导思想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包含许多具体的指导思想。由于这些指导思想命名经历过不同的历史阶段,大众对这些指导思想名称的感知是不太一样的。指导思想命名是一个需要与时俱进的过程,指导思想始终面临一个名称再创新、再规范的过程。这里既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东西,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东西。

① 本报编辑部:《从 Made in China 到 Cultured in China——写在首都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边上》,《南方周末》2008年2月14日。

为了不简单重复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笔者没有采用考据的方法来阐述每个指导思想命名的详细过程。而是借用命名理论，对这些命名过程进行省察，努力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史料性和学理性相结合。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命名，笔者提出：一开始是负面命名，后为正面命名，逐步发展为各方都认可的中性命名。正是基于对这些命名历程的学理性梳理，努力洞悉指导思想命名的规律，由此提出了一些命名的原则。

虽然学术界有一些成果涉及指导思想命名问题，但很少有论者放在指导思想命名建设的高度来研究。本书提出“指导思想命名建设”的概念，把它作为执政党的基础性建设之一，探讨如何实现从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变迁。本书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指导思想命名建设的走向，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指导思想命名问题。本书重新发现和界定“指导思想”这个常见概念，细化“指导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在此基础上，以“指导思想命名问题”为中心，兼顾指导思想的阐释。

全书主要是围绕中国国情来展开论述的，对国外的研究很少涉及。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研究国外情况也是一种重要方法。但由于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所限，要做到这一点还很难，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弥补。西方强调工具论，而中国强调指导思想论。西方国家未必如中国一样，提出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但西方国家通常有着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这些沉淀在社会生活中，隐性存在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庞大、幅员广阔的超大规模国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提出显性的指导思想，提高全民族的凝聚力，统一思想办大事。所以说，由于中西方的人口构成、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目标任务等不同，指导思想命名的表现形式也不相同。这是笔者初步的认识。至于中西方指导思想的详细对比，笔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全书重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指导思想命名问题，而对非执政条件下的情况没有深入分析。执政条件与非执政条件，有什么不同？局部执政与全面执政，有什么不同？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在非执政条件下，主要是进行革命，这时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需要借助外来思想和话语，需要别国别党的物质支持和理论支持，指导思想命名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依赖性。而在

局部执政时期,开始提出自己的指导思想,如1941年开始有人提出“毛泽东的思想”,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此时,指导思想命名表现为半独立性。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鉴于寻求苏联援助等原因,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中不提“毛泽东思想”。20世纪60年代,与苏联决裂之后,中国则干脆重提“毛泽东思想”。此时,指导思想命名表现为强烈的独立性。虽然在指导思想的全称中也会出现马列主义,但主要学习和贯彻的,还是体现即时性、当下性、创新性的指导思想,即全称中的最后一个指导思想。这等于把指导思想简化了。这样,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恰当而全面地表述指导思想,使指导思想的全称和简称具有同一性,而不是互相排斥。

全书本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着眼于对指导思想命名问题的反思,因此特别突出对指导思想命名负效应的分析。虽然笔者对正效应分析得不多,但这不等于笔者没有注意到正效应。即便阐述正效应,笔者也力求成一家之言。学术界对正效应的分析已经较多了,笔者不想重复他人的研究成果。为此,笔者在正视正效应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努力兼顾正反两方面,避免产生新的认识误区。但为了突出研究重点,不可能四平八稳,因此笔者从各个方面重点分析了负效应。

本书是对指导思想命名问题的初步探索,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许多问题还没有充分展开,甚至可能没有涉及。因此,在笔者看来,本书的创作仅仅是一个开端,虽然积累了一些素材,但要研究好这个问题则任重道远。笔者修改本书时,争取每字每句都言之有据,尽量做到前后逻辑通达。凡是自认为达不到这个要求的,通常会删除。由于笔者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盲区,可能还有诸多欠缺。因此,还必须通过持续反思、充实知识、修改提炼而逐步提高,使任何一个说法都确有充分的根据,把学术的批判性和建设性融为一体。比如,加强核心概念的知识化、精细化提炼,避免相近概念的含混不清;努力做到研究思路 and 正文写作的对接,使好的设想和方法落到实处。总之,把握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平衡点,从学术角度尽力去深化。

本书权作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指教。本书多受益于前辈学人的学术成果,在此表示敬意。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邓正来的《中国

法学向何处去》等著作给了很大的启发。这些启发，具体地讲，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主要是语言表述上的，即深入浅出地阐释；邓正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主要是理论框架上的，即选取几种代表性的学术思潮进行学术批判。各种思想成果对笔者的启发都弥足珍贵，由于篇幅原因，恕不一一举例。